

任爽著



「唐帝列传」

唐高宗 皇帝 传

12

吉林文史出版社

1057788

唐 帝 列 传

唐 高 宗

任 爽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1057788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高宗/任爽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皇帝丛书·唐帝列传)

ISBN 7-80528-930-1

I . 唐… II . 任… III . 唐高宗(628~683) - 传记

IV . K827 =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096 号

唐高宗

作 者:任 爽

责任编辑:邱莲梅 吴 燕

封面设计:正典书装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197 千字

印 张:10.25

版 次:199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28-930-1/K·347

定 价:23.00 元



引言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崩逝于翠微宫含风殿。几天以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于柩前,成为大唐王朝第三代皇帝。六月初一日,李治举行登基大典,颁布了《即位大赦诏》。诏文中说:

“大行皇帝奄弃普天,痛贯心灵,若置汤火,思遵大孝,不敢灭身。永慕长号,将何逮及。粤以孤眇,属当元嗣,思励空薄,康济黎元。敬顺维新,仰昭先德,宣布凯泽,被乎亿兆。可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赐勋官一级。诸年八十以上赉以粟帛。雍州及诸州比年供军劳役尤甚之处,并给复一年。”^①

李治的这道赦诏,与历代新君的即位赦诏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赦在押囚徒、赏百官勋位、赐老人粟帛、蠲州县赋役,不过是些陈年惯例;至于赦文中那些表示悲痛的词句,尽管翔雅得体,确实可以反映李治当时的心情,看上去亦属官样文章。其中惟一重要的内容,实际上是把太子登基这一既成事实公诸于天下。然而,新君继统,朝野蒙恩,毕竟使一度压抑甚至紧张的气氛有所松弛。似乎一切照旧:李世民崩逝所留下的阴影将会逐渐消散,大唐王朝的江山社稷将会继续昌盛。

不料,仅仅一个多月以后,晋州(今山西临汾)突然连续

^① 《全唐文》第11卷,《高宗皇帝:即位大赦诏》。



发生两次强烈地震，大批房屋倒塌，五千余人遇难。十一月，晋州再次地震。次年四月，晋州第四次地震，六月又震。一年以后，即永徽二年（651年）十月，晋州又发生第六次地震。晋州是李治被立为太子以前的封地，所谓“龙兴”之处。李治刚刚登基，晋州竟然接二连三发生了六次地震，不能不引起人的忧虑和恐慌。猜测与流言应运而生、不胫而走。一时之间，朝野不安，人心浮动。

当晋州发生头两次地震的时候，李治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安，因此只是下诏慰问灾区，蠲免震区二年赋役，赐每位死难者绢三匹而已。及第五次地震发生以后，李治大为震惊。他自责地对群臣说：“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① 当时，侍中张行成奏道：“天，阳也；地，阴也。阳，君像；阴，臣像。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震，弥旬不休，臣将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且晋州，陛下来封，今地屡震，尤彰其应。伏愿深思远虑，以杜其萌。”^② 李治闻言，深以为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我们都不能说张行成的这番话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专制政治之下，君主主宰操纵一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权力的来源在于统治者，民众与臣工对君主的言行实际并没有多少插嘴的余地。防止君主滥用权力的手段，除了依靠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之外，几乎就只剩下了“天意”。尽管天意茫无头绪，难以捉摸，在今人看来，纯属无稽之谈，但在当时的历史

^① 《旧唐书》第4卷，《高宗本纪》。

^② 《旧唐书》第37卷，《五行志》。



条件下,却是一种无形而有力的震慑。经过人们的附会,自然现象化为天意,或许可以指望君主改恶从善。而那些信以为真的君主也确实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下诏自责,以求消灾弥祸,并且形成了一种惯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崇尚实际上的儒家学派大谈天意,主张“天人合一”,确有其不得已之处。张行成此番言谈,用意之一,就在于借此机会对李治进行规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说张行成此言有所根据,还有另外的理由。李世民晚年,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验,认为是“女主当昌”之兆,而民间又有《秘记》流传,声称唐朝三世之后,女主武王当有天下。这两件事弄得李世民疑神疑鬼,一些无辜的人因此遭难,罪名只是因为他们与“武”字扯上了关系。例如,李世民曾与诸武臣宴于宫中,行酒令,命他们各言其小名。左武卫将军李君羨自言小名“五娘”,李世民闻之愕然,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① 转念又想,李君羨任武卫将军,封武连县公,祖籍武安,小名又叫“五娘”,官职、封爵、籍贯、名字无一不与“武”有关,只怕不会仅仅是一种巧合,便将其贬为华州刺史,不久,又借故将其诛杀。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李治即位以后。风波尚未平息。张行成所云“女谒用事”,即指此而言,希望李治注意政治形势的变化,防患于未然。

遗憾的是,李治的自责并没有阻止地震的再次发生,而张行成的告诫也没有真正引起李治的重视。事有凑巧,此时的李治正打算把在感业寺中出家为尼的武媚娘接回宫中,重温鸳梦。这位李世民生前的嫔妃尽管因其姓氏而遭猜疑,落魄于古寺之中,惆帐于青灯之下,却依然风姿绰约、光彩照

^① 《资治通鉴》第199卷,贞观二十二年。



人，令李治魂牵梦绕、难以忘怀。三十多年以后，正是这位武媚娘废唐国号，做了大周朝的圣神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更加凑巧的是，武媚娘被李治接回宫中的时间，恰好就在晋州发生第六次地震的前后。

大唐王朝的历史由此而改写，李治的形象由此而改观。一千三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翻检这段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残篇断简之时，除了惊诧于历史的因缘巧合之外，还会从中获得什么别的启示吗？

李治为人仁厚纯孝，即位以来，勤政爱民，礼贤下士。史称永徽之治，有贞观之遗风。但是，正如《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当武媚娘夺居后宫、操纵朝政、大开杀戒并进而革唐之命，酿成持续数千年之混局的时候，李治的英名便随着永徽之治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了。抚今追昔，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是女皇武则天的叱咤风云，而李治则成了彻头彻尾的陪衬，甚至李治为维护大唐王朝所做的种种努力，似乎都只能被用来证明他的无能与昏庸。

李治无疑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但是，笔者探微钩沉，撰成此书，用意却并非在为九泉之下的李治鸣冤叫屈。本书试图揭示的主要内容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不仅在于李治自己的弱点，而且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正因为如此，这一悲剧所影响到的就绝不仅仅是李治的名声及其家族的命运，而且是大唐王朝的兴衰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目 录

第一章 仁孝传家	1
第一节 至性天成	1
第二节 储位之争	7
第三节 万吉之瑞	16
第四节 社稷之忧	24
第五节 承绪大统	38
第二章 贞观遗风	43
第一节 稳定政局	43
第二节 发展经济	88
第三节 繁荣文化	105
第四节 巩固边疆	147
第三章 牝鸡司晨	177
第一节 春宫风云	177
第二节 朝廷纷争	194
第三节 宗戚祸难	213
尾 声	245
附 录 唐高宗大事年表	254



第一章 仁孝传家

第一节 至性天成

唐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十五日,太宗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降生于东宫的丽正殿,取名治,字为善,小字雉奴。至于李治为什么会生于东宫,则是因为李渊退位以后,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年)才迁出紫极大内。这期间,李世民仍居东宫听政。

李治少年时期的经历,史籍记载极少。寥寥数语之间,我们仅知道他在四岁的时候,受封为晋王,后来遥领并州都督,又加拜右武侯大将军而已。当时,人们很少谈到李治,似乎忘记了这位九皇子的存在。其中的原因,除了帝王子孙封王拜将事属平常,并无什么实际政绩可言以外,一是李治生性柔弱,喜欢安静,不是那种锋芒毕露、引人注目的角色;二是魏王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储君之位,勾心斗角,风波频起,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李治的这两位胞兄身上。不过,后来时势的变化证明,这种冷落对李治来说,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李治降生之日,为了表示庆贺,李世民宴请了五品以上的官员,并下诏赏赐这一天生子的臣民粟米。但是,忙于军国大政的李世民并没有对李治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尽管帝



王得子是一件喜事，而李治的生母又是长孙皇后，属嫡子之列，特别是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绝非寻常可比。后来，李治稍长，开始向著作郎萧德言学读《孝经》，李世民问李治：“此书中何言为要？”李治回答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李世民闻言大悦，方才对李治另眼相看。不过，李世民对李治的赞赏，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宽慰，认为李治如果恪守《孝经》宗旨，身体力行，则“足以事父兄、为臣子”而已，并没有抱什么过多的期望^① 因为李世民那时还认为，李治过于柔弱，既少才华，又乏胆略，与自己相比，看不出有什么相似之处，根本不可能继承大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一时期中的李治，如果说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什么印象的话，那就是“宽仁孝友”^② 其实，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概括李治一生中为人处世的基本特点。但是，追寻这种性格形成的根源，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仅缺乏有关这一问题的直接资料，甚至从李治周围的人身上，也很难找到间接影响李治性格的大量因素。

李世民刚毅多谋，胆识俱佳，而且雄心勃勃，不甘屈于人下。自李渊起兵太原，李世民参与谋议，联络豪杰，统军出征，剿灭群雄，冲锋陷阵，指挥若定，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前后，李世民谋夺储君之位，同室操戈，弑兄杀弟，迫父让位，策划周密，毫不手软。尽管旧史竭力隐讳此中真情，极尽涂抹粉饰之能事，却无论如何不敢用“宽仁孝友”之

① 《旧唐书》第3卷，《高宗本纪》。

② 《旧唐书》第3卷，《高宗本纪》。



类的词句来形容这位圣主明君。而李世民认为李治“仁懦”、“柔弱”，与自己不甚“相类”，事实上也承认了自己对李治性格的形成并无太大的影响。

长孙皇后为人宽厚，似乎与李治的性格有某种传承关系。长孙氏曾被异母兄逐出家门，及立为皇后，不记前嫌，多次请求李世民对这位异母兄加以厚待，使其位至监门将军。后来，这位异母兄牵连谋反大案，李世民意欲加诛杀，又是长孙氏为之求情，得以免死。后宫之内，嫔妃有获罪者，长孙氏每每为之开脱，不使蒙冤。豫章公主生而母亡，长孙氏亲自抚养，视如己生。侍婢染疾，长孙氏尤加关照，用自己所服的药物为其治疗，故上下感戴，服膺其德。李治的性格受其生母影响，看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宽厚只是长孙氏性格的一个侧面。其实，人们从她的言行中感受最深的是她的聪慧与明智，而李治对这一点却继承得很少。

长孙氏少好读书，尤识大体。自从十三岁时与李世民成婚以来，不仅克尽妇道，而且颇有内助之功。尤其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明争暗斗，冲突频起之际，长孙氏上奉李渊，下事后宫，为李世民周旋弥缝、消嫌释猜，费尽心机。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将率将士入宫，长孙氏亲加慰勉，众人振奋，对政变的成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李世民登基以后，长孙氏立为皇后，虽贵宠无比，却坚决不肯干预朝政。李世民多次试图与她谈论军国大事，长孙氏都加以推辞，认为：“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李世民询问再三，长孙氏始终不答。李世民无奈，只得作罢。长孙氏最明智的举动，莫过于抑制亲族，不许他们居高位、掌大政。李世民曾打算



任命她的胞兄长孙无忌为相，长孙氏竭力劝阻。她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李世民不从其请，长孙氏又暗中命长孙无忌坚辞不受，结果李世民只好让步。及长孙氏病危，太子李承乾请求宣布大赦，广度僧道以祓灾，长孙氏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当时，李世民与朝臣也曾议论实行大赦，但长孙氏执意不从，事遂不行^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孙氏的宽厚也是以一种通达机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贞观六年（632年），长孙氏之女长乐公主下嫁，李世民命有司厚加资送，规格超过永嘉长公主。魏征力谏，李世民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氏。长孙氏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杜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一次，李世民罢朝，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氏问明原委，换上朝服向李世民道喜。李世民不解其意，长孙氏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一席话说得李世民怒气全消，心中大悦^②。

长孙氏不仅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子女，而且十分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太子李承乾的孔母曾对长孙氏说：“东宫器用阙

① 《旧唐书》，第51卷，《后妃传》，上。

② 《资治通鉴》第194卷，贞观六年。



少，欲有奏请。”长孙氏回答道：“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① 立德扬名，这是长孙氏对太子李承乾的期望，同时也是她对自己所有子女的期望。令人遗憾的是，李承乾并没有认真听取她的训诲。至于李治，情况似乎更糟。李治继承了她的宽厚，却没有继承她的明智。尤其是她政治嗅觉的敏锐与为人处世的练达在李治身上几乎毫无反映，而这些品质往往是一个成功的君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宗室成员，在激烈的权力冲突中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天性中的良善使自己免遭不测。李承乾辜负了长孙氏的期望，失去的只是太子之位；而李治缺乏应该具备的品质，失去的却是大唐王朝的江山社稷。

李治九岁的时候，长孙氏与世长辞，年仅三十六岁。长孙氏临终，嘱咐李世民说：“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这位皇后的早逝，使李世民悲痛万分。长孙氏生前曾经把古代妇女的美德与善行搜集起来，编成《女则》十卷，并亲自作序。长孙氏死后，宫司将《女则》呈上，李世民睹物思人，更增悲痛。他把《女则》展示给近臣，对他们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②

① 《旧唐书》，第51卷，《后妃传》，上。

② 《旧唐书》，第51卷，《后妃传》，上。



对李世民来说，长孙氏既是爱妻，又是良佐，自然难以忘怀。事实上，长孙氏之死的确对李世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至少使他在一段时间里感到寂寞。不过，帝王毕竟是帝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往往只是暂时现象。不久以后，李世民便开始打算另立一位皇后。而对长孙氏的子女来说，他们失去的却是母亲。尤其对九岁的李治来说，这一损失是巨大而永远无法弥补的。从现存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直接记载来说明长孙氏对李治如何疼爱，但是，从长孙氏的为人以及长孙氏死后，李治哀泣不已，左右皆为之感动的情况来看，母子之间的感情相当真挚深切，并没有虚伪矫饰的痕迹。而李治也的确不是一个善于弄虚作假的人。后来，李治在谈到长孙氏时曾说：

“寡人不造，咎谴所钟。年在未识，慈颜弃背。终身之忧，贯心滋甚。风树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龙忌之辰，岁时兴感。空怀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远，瞻奉无逮。徒思昊天之报，罔寄鸟鸟之情。”^①

从中可以看出，李治对亡母的思念深沉而持久，影响不可低估。

李治的哀泣不止使李世民又添几分悲痛，同时也使他对这个幼弱的儿子增加了几分怜惜。他尽力而为，安慰李治。为了表示对李治的优宠，加拜他为右武侯大将军。但是，这时的李治对政治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因此，加官晋爵能否真正使李治丧失母爱的悲伤得以缓解，事实上很难说得清楚。而我们却有理由认为，长孙氏的早逝使天性柔弱的李治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某种障碍，使他的性格中更加缺少自

^① 《全唐文》第11卷，《高宗皇帝：为文德皇后荐福令》。



信与决断的因素。

第二节 储位之争

从贞观十年(636年)长孙氏死去到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治被立为太子,七年时间,忽焉而逝。在这七年之中,有关李治的生活状况我们仍然知之甚少。不过,从李治被立为太子之际,群臣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如何“仁孝”,如何“宽厚”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大致看出,丧母的不幸尽管对李治影响很大,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治的成长道路。

这一时期中的李治也许有些孤独。不过,大体说来,他生活得平淡而又安静,既没有堕落下去,但也不见大的长进。他仍然不引人注目,似乎将永远扮演被人遗忘的角色。至于后来被立为太子,几乎可以说纯系时势的偶然,没有证据表明李治曾为此而奔走钻营。太子之位从天而降,李治只是顺其自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而已。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存在,君主以天下为家、为私,政权的转移不由民意、公意,改朝换代、天下易姓,或大规模武装冲突,或小范围阴谋篡位,杀人流血,风云变幻,自然不消说得;即使是正常的帝位承袭,由于政治生活中缺乏透明度,因此,尽管有所谓“立嫡以长”的继承原则,其中也时常弥漫着一种神秘色彩,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疑案与悬念,出现人们始料不及的结局,实际上极为平常。

李世民一共有十四个儿子。长孙皇后生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杨妃生吴王李恪、蜀王李愔,阴妃生齐王李祐;燕妃生越王李贞、江王李嚣;韦妃生纪王李慎;杨妃生



赵王李福；杨氏生曹王李明；王氏生蒋王李恽；后宫又生有楚王李宽、代王李简。如果按长幼顺序排列，他们依次是李承乾、李宽、李恪、李泰、李祐、李愔、李恽、李贞、李治、李慎、李器、李简、李福、李明。十四子之中，李承乾既为嫡出，又系长子，立以为储君，顺理成章，自然不会发生什么争论。至于李承乾后来被废黜，是由他自己的失误与形势的变化所造成的。

李承乾生于武德二年（619年），因为生在承乾殿，便取了这个名字。两岁时，封为常山王，六岁时，徙封中山王。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成为唐王朝第二代皇帝，八岁的李承乾也被立为太子。

从天资上来说，李承乾无疑要比李治优越得多。立为太子之时，他已经以“聪敏”闻名，并因此深得李世民的喜爱。后来，李渊死去，李世民居丧期间，便由李承乾处理庶政，而李承乾也确有出色的表现，颇识大体。李世民曾夸奖李承乾“文过志学，秉性聪敏，频年治国，理务允谐。”^①自此以后，李世民外出行幸，常令其居京监国。不过，李承乾虽然聪敏，却对政治的凶险缺乏必要的认识，对长孙氏教诫他立德扬名的苦心也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他成长于深宫之中，不脱帝王子孙的纨绔习气。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承乾对声色狗马的喜好日渐显露，平日宴游无度，甚至嬖爱一个太常乐人，弄得满城风雨。李世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诛杀了这个乐人，李承乾大为悲伤，父子之间隔阂日深。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使李承乾的太子之位发生动摇的原因却并不在这里。

^① 《全唐文》第5卷，《太宗皇帝：命皇太子权知军国事诏》。



就李世民本人来说,他从三个方面对李承乾相当不满。其一,李氏家族虽然以武力得天下,但是,“逆取而以顺守之”,乃通行之法则。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此中道理,李世民自然十分清楚。所以,执政以来,偃武修文、制礼作乐、尊贤重士、修养百姓。而李承乾对李世民的举措似乎并没有什么了解。他对此不感兴趣,喜好的是胡人风俗与阵营厮杀。文献记载说,李承乾经常使户奴数十人学胡人音声、梳妆,服饰,为胡舞,鼓角之声通夜不绝。又造大炉、大鼎,招引亡奴偷盗牛马,亲自监督烹烤之事,然后与侍从厮养共器而食。他习突厥语言,着突厥服装,挑选状貌类似胡人者,披以羊皮,结发辫,令五人建一部落,置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自己则升幡旗、设穹庐而居,命诸部聚羊而烹,抽佩刀割肉而食。忽而大发奇想,假作可汗身死,使众人号哭靡面,奔马环行而临丧。忽而跳起来说:“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当一设,顾不快邪!”左右窃窃私语,以为中了妖邪之气。又以毡为铠,列丹帜,勒部阵,与汉王李元昌分别统领,呼喊击刺,以为笑乐。不肯用命者,往往受到严厉责罚,有致死者。李承乾的这些言行,不仅荒谬,而且与李世民的想法与期望背道而驰。李承乾所说的“思摩”,即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的酋长。李承乾身为大唐王朝储君,竟然舍华而慕夷,甚至表示要在得天下之后去做突厥酋长的部下,不能不引起李世民的恼怒。即使这番话纯属戏言,也可以说讲得过于离谱,至少不合储君的特殊身分。沉湎于武嬉而又惑溺于胡俗。使李世民完全有理由认为李承乾是一个乱国乱家的角色。

其二,治理国家,要在得人。礼贤下士,厥为要务。君主专制政治,帝王独揽大权,此为人所共知。但是,独专并不意味着独治。政治体制的特征并不能与政治过程